

# 『我们不能嫁祸于海，一点儿也不行』

□ 曹前发

周恩来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50年前，他就强调指出：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必须绝对安全可靠。我们不能嫁祸于海，一点儿也不行。

## 高度关注海洋环境问题

周恩来密切注视着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所引起的江河湖海污染问题，要求我国在工业发展中尽早注意这一问题。

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多次谈到美国的河湖与海洋污染问题。1970年6月21日，他向有关人员详细询问了美国、苏联、秘鲁、荷兰、挪威、英国等国家的水产产量及水产品种情况。当得知美国水产产量由1966年的250万吨下降到198万吨时，他问道：“为什么？是不是工业污水造成的？”

船舶、运载核武器的船容易污染海水。为此，加拿大规定，从北冰洋起，北海领海100海里不准任何污染海水的船只通过。周恩来支持加拿大的规定，并说，整个美洲都发生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同样会提到地中海沿海国家，提到亚洲国家、非洲国家的议事日程上。周恩来还谴责在海洋进行核试验、向海洋倾倒垃圾以及用电击方法捕鱼等等，是为了霸权、为了赚钱而不顾一切后果的罪恶行为。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末，水污染事件不断发生。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的水污染愈演愈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位于本州岛中部大阪府和京都府附近的琵琶湖也受到污染。周恩来对中国近邻日本的水污染十分关心。1970年12月6日，他对日本来宾说，日本在工业大发展的条件下，“公害”情况怎样？哪种“公害”最严重？是污水、废气还是垃圾？

两天后的12月8日，周恩来接见菅沼正久等日本友好人士，当得知日本因污染而塘泥不能用作肥料时说：被工厂里的废水、污水污染了。“公害”的废水、污水侵入人体，所以使人不健康了。1971年2月15日，他说，现在“公害”已成为世界的大问题，废气、废水、废渣对美国危害很大。日本最大的琵琶湖都污染了，近海已无鱼，非到外海打鱼不可。

周恩来十分重视对水源污染的防治。他批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给河流、海洋乃至整个地球带来的污染和破坏，并指出中国在向工业化

与现代化的发展中要吸取西方的教训，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1972年10月，发展中国家代表在联大第二委员会讨论人类环境会议报告时谴责西方发达国家破坏人类环境的行为。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4年1月30日，中国国务院批转交通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的报告，要求交通部、国家海洋局会同有关部门和地区组织实施。

## 强调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必须绝对安全可靠

周恩来从保护全人类健康的角度，强烈批评有的国家多次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他还关注核潜艇和核电站排放的废气、废水和废物对人类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出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1970年7月15日、16日，周恩来在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指出：在海里，核潜艇的废水和排烟怎么办？最好不要使海洋环境受到影响。周恩来对于泰山核电站工程，要求在设计、施工时就注意对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问题。1970年12月15日，周恩来在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听取泰山核电站工程汇报时指出：要想法把废水统统吸收掉，蒸发到空气中也有毒吧？焚烧，气也跑了，还是要回收。废气的问题比较大。强调，我们不能嫁祸于海，一点儿也不行。1974年3月3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再次听取泰山核电站工程技术情况汇报。在谈到核电站的安全问题时，他强调：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必须绝对安全可靠，特别是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从长远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

## 应该以十万分的紧迫感重视环境保护

周恩来十分注意学习和借鉴国外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经验。他明确指出，要看自己的问题，要注意向国外学习。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组成出席该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熊向晖被任命为代表之一。行前，周恩来嘱咐熊向晖应相机了解美国的环境保护情况。

在纽约期间，熊向晖从《纽约时报》上剪辑有关美国主要社会问题的一些材料，归国后译出，以《美国社会剪影》为题印发。其中关于美国环境保护工作的情况，周恩来最注意的是以下两篇：第一篇：《密西西比河：污染的通路》（摘译），原载1971年12月8日《纽约时报》。主要内容讲：美国人正在摧毁他们伟大的河流。但是现在，密西西比河却成了排污纳毒的壕沟。它现在是如此之脏，以致几乎不可能在其中游泳或捕鱼了。

第二篇：《州长说，“不可能”》（摘译），原载1971年12月10日《纽约时报》。主要内容讲：洛克菲勒州长今天说，参议院通过的在1985年以前停止向全国水道倾倒污染的物质的法案，其目标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看了上面两篇报道后，周恩来说了两句话。一句是：绝不让我们的长江变成密西西比河！另一句是：治理污染要花钱，但是光靠钱治理不了污染！

1972年10月，周恩来嘱咐科学家钱伟长在随我国科学代表团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期间，考察这些国家的环境保护问题。钱伟长访问4国后，向周恩来交出了一份有关这4国环境保护工作的5万字报告，并提出了有关我国在环境保护管理和政策上的建议。

钱伟长在报告中说，西方很多环保学者称，破坏自然环境就会遭受大自然的惩罚，乃至亡国，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残酷的现实。现今西方人已经关注和担心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这是人类别无选择的家园。西方人开始责问自己：社会的进步难道必须以破坏自己的家园为代价吗？

钱伟长呼吁，为了子孙后代，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国家应该以十万分的紧迫感重视环境保护。钱伟长在报告中向周恩来建议成立国家环保局和环保科研机构。

1972年6月5日至16日，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国派出以唐克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

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了世界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会议结束后，代表团回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他指示，立即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不仅是世界环境保护的里程碑，也成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转折点。

# 今日徒河溶溶水 多少忠烈血换来

## ——冀鲁边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敬读

□ 陈 赛 闫化川

在山东省乐陵市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内，矗立着冀鲁边区人民英雄纪念碑和烈士墙。纪念碑高9.30米，象征9月30日烈士纪念日，碑身正面镌刻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鎏金大字。两侧的烈士墙刻有冀鲁边区24个县市区 的30215名烈士名单，寓意是让每一位烈士都继续关注他们曾经抛头颅、洒热血的这片沃土，关注冀鲁边区各项事业的发展。纪念碑背面刻有碑文，全文如下：

冀鲁边区，沃原辽阔，民风淳朴刚毅，志士仁人辈出。百余年来，国遭欺凌，冀鲁边区儿女挥长缨卫社稷，诛顽敌正乾坤，披荆斩棘，功勋卓著。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即于冀鲁边区大地点燃燎原星火；抗战时期，成为抗战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又成为我军之坚强后方。历次革命战争期间，数万名冀鲁边区儿女从戎报国，彼等前仆后继，浴血疆场，有十余万人英勇献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冀鲁边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城乡面貌万象更新。无数优秀儿女为中华民族之解放和发展贡献杰出，其光辉业绩彪炳史册，千古传颂；其崇高精神辉耀大地，万民景仰；其英名将永远铭刻于人民心中。

为褒扬人民英雄，启迪并激励后人，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开创冀鲁边区更加美好之未来，公元二零一四年初，秉承广大人民群众夙愿，特立斯碑以志。

中共德州市委  
德州市人民政府  
公元二零一四年九月

伫立碑旁，敬诵碑文，冀鲁边区艰苦奋战的峥嵘岁月历历在目，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铸就的冀鲁边精神熠熠生辉，照耀着后继者前行之路。

## 山东抗日烽火在冀鲁边燃起

冀鲁边区亦称津南、鲁北地区，是天津、济南两大重镇南北相夹的战略要地，徒骇河穿流其间。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迅即沦陷，日寇沿津浦路南犯，冀鲁边区首当其冲，最先遭到日寇铁蹄践踏。在这危亡关头，冀鲁边区党组织果断承担起领导抗战的重任，于7月15日组建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站在了华北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最前列。8月13日，抗日救国军在乐陵县黄夹镇发动了山东省最早的抗日武装起义，而后东征西讨，连克日伪侵占的盐山、无棣、乐陵、庆云等县城，建立了数个抗日民主县政府，控制了以乐陵为中心的东西约百里、南北约五六十里的区域，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1938年，根据毛泽东“派兵去山东”的指示，八路军主力部队点将拨兵分赴各地。9月，肖华率领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进驻冀鲁边区乐陵县城，对边区各路抗日队伍进行统一整编，全力组织开展对日作战，使冀鲁边抗日烽火迅速燃成燎原之势。到1939年9月，冀鲁边区的抗日武装力量由原来的不足3000人发展到2万余人，成为山东六大战略区中主力部队发展最快、人数最多的一个区。

## 平原抗日根据地艰苦奋战的典范

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直接震慑着被日寇视为“生命线”的津浦铁路大动脉和沿线的天津、沧州、济南等城市。1939年至1940年，为增援山东抗日根据地，边区先后分9批输送15000余名官兵转战鲁西、鲁南。边区主力部队转移后，日寇重兵回师华北，利用冀鲁平原缺乏屏障的地形特点，采取以据点、公路为链锁的“囚笼政策”，动用机动部队快速出击，在“囚笼”中反复搜索“扫荡”、来回穿插“蚕食”。久经考验的冀鲁边区党政军民没有退缩，咬紧牙关，克服困难，采取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的斗争策略，灵活机动地坚持平原游击战。

冀鲁边区没有山，人民群众就是最大的靠山。边区军民同心同力，改造平原地形，大挖地道，把道路挖成纵横交错、村村相通的交通沟，阻滞日寇的行军速度，又便

于抗日部队伏击敌人、隐蔽转移。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地下长城”的掩护下，边区部队在“囚笼”中巧与敌人周旋，广泛运用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麻雀战等战法，积极开展反封锁斗争，以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英勇反抗精神，粉碎敌人大规模“扫荡”10余次、“治安强化运动”5次，击退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数次摩擦和袭击，有力牵制、打击和消灭了大量敌人。在对抗斗争中，边区发展成为有2.5万名党员和2万余人的武装，活动区域达24个县、600万人口的重要战略区，成为全国两处坚守下来的平原抗日根据地之一。

## 冀鲁边精神永放光芒

敬读碑文，抚今追昔，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当年冀鲁边区党政军民在艰苦奋战中所迸发出的坚定信念和英勇气概。“敢为人先、大爱为国、不屈不挠、团结奉献”的冀鲁边精神跨越时空，依然让人荡气回肠，热血沸腾。

敢为人先，开拓奋进。冀鲁边区共产主义思想传播早，党的组织建立早、活动早，为开展抗日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边区的革命先烈高擎战旗，誓死抗争，创造了山东抗战历史上的“四个第一”：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是山东第一个抗日民众团体和武装，领导了省内第一次农民抗日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第一枪，在乐陵创建了第一个县级民主政府，充分体现了边区军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底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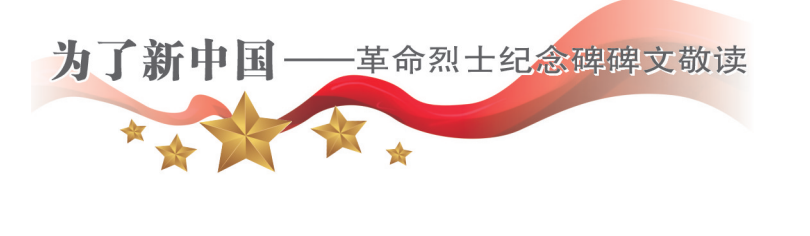
同甘共苦，大爱为国。冀鲁边区军民同仇敌忾，生死与共，涌现出无数英雄模范。“边区慈母”马振华为保证战士们能吃饱肚子去打仗，把自己饥肠辘辘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赶去讨饭，不让他们吃军粮。深明大义的革命母亲常大娘，为掩护战士挖成可容纳近百人的地道，



成为边区三地委和靖远县委的机关驻地，毛泽东称赞她为“大爱为国，革命母亲”。当时边区有首歌谣唱到“八路军呀好比一条鱼呀，老百姓就是河中水呀”！生动诠释了边区军民鱼水情深、同甘共苦的真挚情怀。

不屈不挠，坚韧自强。在八年全民族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冀鲁边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始终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牢不可破的革命阵地，使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岿然屹立于星罗棋布的碉堡岗楼之中，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70多名县团级以上干部慷慨就义，10多万基层干部、战士和群众为国捐躯，充分展现了边区军民不畏牺牲、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精诚团结，无私奉献。冀鲁边区党组织高举抗日旗帜，团结改造国民党进步势力、地方实力派，组织动员回族群众，共同抗战。冀鲁边区回民支队能征善战，多次受到通令嘉奖，国民党任命的乐陵县长牟宜之倾其县府财粮积蓄支援八路军，还有散尽家财的开明乡绅、潜伏敌穴的“两面村长”，不遗余力为抗战部队提供物资援助，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爱国热情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为党工作而劳累至死”的高君宇

□ 姜 云

两城市不同社会阶层工人的经济社会情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会议决定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9月13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由蔡和森担任主编，高君宇任编辑。从1922年9月至1924年9月两年的时间里，他在《向导》上发表了近30篇文章。他还参加了中共北方区委的《政治生活》、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先驱》等刊物的编辑工作，撰写了40多篇文章。在这些进步刊物里，他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号召要打倒阻碍和平的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高君宇同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恽代英5人被任命为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

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党的西湖会议决定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之后的中共三大最终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高君宇协助李大钊开展北方地区的统战工作，并在同年3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成立后，担任总务股主任。1924年10月，和张太雷等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平定商团叛乱的斗争。11月，他随孙中山离开广州，抵达北京，因积劳成疾，住院治疗。1925年1月，孙中山决定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高君宇坚持要求出院，抱

病投入大会筹备工作。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高君宇出席了会议，并和李大钊等30人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3月2日，忽感腹部疼痛，仍坚持工作。4日，腹痛加剧，难以支持，被送至协和医院。6日凌晨零时二十五分，因急性阑尾炎术后腹膜脓肿伴有败血症，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年仅29岁。

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1921年，在北京一次山西同乡会上，高君宇与石评梅相识并成为恋人。他在写给石评梅的信中说，“我很信换一个制度……所以我要我的意念和努力完全贯注在我要做的‘改造’上去了”，并劝导石评梅“粉碎这些桎梏”“来担当破灭悲哀原因的事业”，成为“奋斗的人”。1925年1月28日，高君宇和石评梅游陶然亭，他在写给石评梅的信中述说了当天美好的时光。一个多月后，高君宇病逝，依其生前的愿望，同志们把他安葬在陶然亭。3年后，石评梅因思念过度也随他而去。正如她刻在高君宇墓碑上的文字，“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的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亲友依据石评梅“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遗愿，将她安葬在高君宇的墓旁。1956年，周恩来审查北京城市规划时提到陶然亭的高石墓，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也有教育。”